

外國語言文學論文集

河南大學科研處

一九八五年

外语论文集

- 1 鲁迅与翻译……………刘炳善(1)
- 2 鲁迅与美术……………刘炳善(27)
- 3 英国随笔简论……………刘炳善(48)
- 4 马克思与外国语……………马中平(61)
- 5 勃朗特姊妹创作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问题……………周忠和(73)
- 6 汉英古今音变互证……………赵帆声(84)
- 7 论均衡作用在英语音变中的体现……………赵帆声(95)
- 8 分词短语及其逻辑主语……………吕长发(110)
- 9 谈谈英语的双宾语……………孙高升(106)
- 10 怎样识别以-ing结尾的词……………孙高升(122)
- 11 反映思想转折的语言现象……………陶亮采(131)
- 12 英语词类管窥……………刘光耀(134)
- 13 英语中的名词关系从句……………刘光耀(142)
- 14 从《落日金辉》谈英诗教学……………王宝童(153)
- 15 漫谈中学英诗教学……………王宝童(161)
- 16 英语回响疑问句……………郭天相(168)
- 17 英语选择试题及其作法……………张廷仪(172)
- 18 略谈英语动词不定式的主动形式与被动形式……………苗普敬 吴进业(188)

鲁迅与翻译

刘炳善

“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①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同时在翻译工作中他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一生从中国人民的需要出发，高度重视翻译工作，坚持不懈地从事翻译工作。他在翻译工作方面所进行的大量实践和提出的理论主张，是他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精神遗产。

一、“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

鲁迅生于清末1881年。这时中国正处在一个民族民主革命的时代。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被称为新学的外国自然科学新成就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在那时“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②因此，它受到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人的欢迎。而翻译事业就在这个新学的传播中起了打头阵的作用，其代表人物则是《天演论》的译者严复。

鲁迅在青年时代积极投入了当时新学的传播活动。他在南京上学时，不顾顽固的“本家老前辈”的阻扰，看新书，读《天演论》，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一到日本留学，就通过翻译和编写文章来介绍外国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发表了《月界旅行》等书和《人之历史》等文章。这使他吸收了初步的唯物主义思想。

①②《新民主主义论》

日俄战争爆发，中国东北沦为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进行争夺的战场，中国人民惨遭蹂躏。这一事件大大震动了鲁迅，打破了他“科学救国”的幻想，使他的注意力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政治。他认识到，没有觉悟的人，“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③结果便是《域外小说集》的翻译和《摩罗诗力说》的写作。

《摩罗诗力说》可说是鲁迅早期的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纲领书。为了使中国人从封建复古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鲁迅主张“别求新声于异邦”。在这一文艺论文中，他用社会进化和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向中国人民介绍了一批“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的诗人，这就是包括普希金、密支凯维奇、彼多菲、雪莱、拜伦在内的一批爱国、民主诗人。这些诗人，都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反动、守旧势力——引者）所不甚愉悦者”^④。他们是反抗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精神界之战士”。介绍他们的生平和创作到中国来，对于受封建统治压迫、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是有启蒙作用的。而在鲁迅在他第一部翻译作品《域外小说集》中，更把介绍的重点放在呻吟在俄国沙皇铁蹄之下的东欧人民的文学上，这在当时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后来鲁迅说明道：

“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世界上也有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集外集拾遗》、《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

③ 《（呐喊）·序》

④ 《摩罗诗力说》

这种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之间所产生的共鸣，有助于提高当时中国人民争自由、求解放的觉悟，并促使他们向世界上其他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汲取经验。这就是鲁迅在青年时代积极翻译介绍外国被压迫人民的文学的根本原因。

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了，但接着统治人民的是北洋军阀。北伐战争，北洋军阀被打倒了，但接着统治人民的是国民党反动派。“长夜难明赤县天。”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沿着艰苦曲折的道路前进。因此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命运，总是息息相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鲁迅一生的翻译工作中，世界被压迫人民的文学始终占着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鲁迅的翻译工作，从一开始就自觉地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着，从来没有沾染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尘垢。鲁迅始终是扎根在中国大地之上的文化革命战士。

二、“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

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大希望。鲁迅欢呼这新时代的曙光，在它的鼓舞下投入了五四运动，用自己的小说、随感录和杂文，为现代中国的新文化革命运动的诞生和发展披荆斩棘，杀开了一条血路。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势力，对于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感到惊慌失措。他们抛出所谓“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整理国故”等口号，引诱青年钻到古书堆里，走复古倒退的路。鲁迅顶住文化界的这股逆流，提出了“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一——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⑤。他这时勤奋地搜求和阅读关于十月革命的书籍，提高自己对于十月革命的认识，并且大力支持进步青年组织“未名社”，翻译出版关于十月革命的文学作品《十二个》、《争自由的波浪》以及文

⑤ 《华盖集》：《青年必读书》

艺论文《苏俄的文艺论战》等。这些作品和文章，在封建军阀卵翼下的“狗屁文艺”充斥中国文坛的当时，曾经帮助青年读者了解十月革命，并且认识中国革命发展前景的进步作用。鲁迅在《〈争自由的波浪〉小引》中说：

“翻翻过去的血的流水帐簿，原也未始不能够推见将来，只要不将那帐目来作消遣。”

“……总之，平民总未必会舍命改革以后，倒给上等人安排鱼翅席，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上等人从来就没有给他们安排过杂合面。只要翻翻这一本书，大略便明白别人的自由是怎样挣来的前因，并且看看后果，即使将来地位失坠，也就不至于妄鸣不平，较之失意而学佛，切实得多了。”

鲁迅在1926年写的这些话，实质上是说明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对于剥削阶级实行改造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在那样的时代，能够有这样深刻的认识实在是很有价值的。

1926年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鲁迅站在青年运动的前列，指导着爱国学生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斗争。接着他经厦门到了广州，这时他和共产党人、革命青年的联系更密切了。

国内阶级斗争的急剧发展，“4、12”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以血与火的事实促进了鲁迅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痛感到学习、掌握马列主义的重要性。他“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⑥

此后，随着毛主席、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文化革命运动的深入，其标志之一就是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理论的翻译介绍大为增多了，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论著也增多了。作为这个文化革命运动的一部分，也出现了革命文学运

⑥ 《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

动。但这个革命文学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由于马列主义水平和世界观的局限，在文艺理论问题上表现出很大的幼稚性，发生了争论也无法正确解决。在这时迫切需要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革命文学运动。在革命需要的推动下，鲁迅在1928——1929两年间翻译了《文艺政策》、《艺术论》、《文艺与评论》等书。在鲁迅带动下，一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了。这对于新兴的中国革命文学，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鲁迅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和严肃认真的态度来翻译这些书籍。他说：

“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而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然而我也愿意于社会上有些用处，看客所见的结果仍是火和光。

“我自信并无故意的曲译，打着我所不佩服的批评家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一笑，打着我的伤处了的时候我就忍疼，却决不肯有所增减，这也是始终‘硬译’的一个原因。”⑦

鲁迅在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当中的严肃态度，是和他“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态度相一致的。正是这种认真改造自己世界观的态度，使得他在联系现实斗争学习马列主义，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之中，逐渐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最后成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

鲁迅一方面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革命文学运动，“纠正了自己和其他人在理论上的偏颇”，同时也着手输入苏联的新兴无产阶级文学作品，作为中国革命文学创作的借鉴。他说：

⑦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我看苏维埃文学，是大半因为想介绍给中国，而对于中国，现在也还是战斗的作品更为紧要。”⑧

为了给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输入先进的范本”，鲁迅亲自翻译了《毁灭》，组织了《铁流》的翻译。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没有一个书店敢于承印，鲁迅就自己拿钱，用一个“三闲书屋”的名义出版了这两部革命作品。

只要读一下鲁迅的《〈铁流〉编校后记》以及他为“三闲书屋”写的出版广告，就可以看到他是怀着怎样的革命责任感，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来使得革命文学译本内容完善、插图精美，然后把它们献给中国的劳动人民，发挥它们应有的战斗作用。

这两本书出版以后，鲁迅怀着胜利的喜悦写道：

“今年总算将这一纪念碑的小说（指《毁灭》——引者），送在这里的读者们的面前了。译的时候和印的时候，颇经过了不
少艰难，…但我就象亲生的儿子一般爱他。还有《铁流》，我也很喜欢。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决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谈到毫无踪影。不过我以为这只是一点小小的胜利，所以也很希望多人合力的更来介绍，…那么，不但读者的见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来，就是新的创作家，也得了正确的师范了。”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为了使这两本革命书籍能够落到贫穷的读者手里，鲁迅特别印了400张“特价卷”，让没有钱的读者可以半价买到这两本书。另外，根据上海一位电车工人的回忆，鲁迅在书店看到这个工人非常喜爱这两本书而又买不起的时候，就把自己译印的《毁灭》亲手赠送给他，《铁流》因系别人所译，只收了一元成本费。鲁迅为劳动人民译书印书的苦心孤诣，他对人民的热爱，直到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使我们感到温暖，深深地感动着我们、教育着我们。

⑧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毁灭》和《铁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一次大胜利。

毛主席指出：“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象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⑨

鲁迅所播下的革命种子，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终于开出了鲜花，结成了硕果。

四、“寄希望于将来”

“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于菟。”在鲁迅的博大胸怀中，是时时想到孩子们的。在旧社会，“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这是鲁迅深以为虑的。他对少年儿童关怀，不仅表现在创作和杂文里，也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中。儿童文学在他各个时期的翻译中都占着一个显著的地位。1922—1923年，他翻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和《桃色的云》，1928年翻译了《小约翰》，1929年校译了《小彼得》，1935年他翻译了《表》，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即1936年，他校印了《远方》。这些工作，都体现了鲁迅对孩子们的殷殷之意。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正在译童话，亦尚存希望于将来耳。”^⑩

在旧社会，儿童往往被“看作一个蠢才”，统治阶级拼命用封建的孔孟之道毒害和麻醉儿童的幼小心灵，使他们“向驯良方面发展”，以便长大了好成为奴隶或奴才。那时让儿童看的书，是几百年来流传下来的宣扬封建礼教的《三字经》、《二十四孝图》之类，或者是图画死板、色采恶浊的《看图识字》和一些内容粗劣的刊物。永远是“司马温公敲水缸”、“孔融让梨”，“小狗叫，

^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⑩ 1935年1月8日鲁迅致郑振铎信。

小猫跳”，或者是外国阔人的“轶事”。在充斥着这些封建的、买办的腐朽读物的恶浊空气中，鲁迅翻译的《表》，校译的《小彼得》，校印的《远方》等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于当时的孩子们又该是多么新鲜、有益、珍贵的读物啊！

“给儿童看的图书必须十分慎重。”鲁迅怀着对于孩子们的深切爱护来进行儿童文学的翻译工作。他在校改《小彼得》时，看到译文“每容易拘泥原文，不敢意译，令读者看得费力，”为了尽量使孩子们好懂，“当校改之际，就大加改译了一通，比较地近于流畅了。”

在翻译《表》的时候，鲁迅“抱了不小的野心。第一，是要将这样崭新的童话，介绍一点进中国来，以供孩子们的父母，师长，以及教育家，童话作家来参考；第二，想不用什么难字，给十岁上下的孩子们也可以看。”（《表》序）鲁迅这些话重心长的话，对于今天的儿童文学工作者仍然是宝贵的意见。

五、做培养天才的泥土

在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民不聊生，文化落后。处在这样的荆天棘地，去做开拓革命文化事业的工作，必然是障碍重重，步履维艰。唱高调的资产阶级文人学士，仰起他们的尊脸，大叫“中国有半个莎士比亚没有？有半个托尔斯太没有？”却不肯动手去做一点踏踏实实的工作。鲁迅批驳了这种“天才论”的侈谈。他在《未有天才之前》中写道：

“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生长成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比花木还重要。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

鲁迅对于翻译工作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自己的译作，更多的工

作是以甘当泥土的精神去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对于青年的译稿，鲁迅常常挤出休息时间，对照原文，为之校阅修改。而且“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用的意思。”

一天，鲁迅家的保姆领孩子到隔壁刚搬过家的外国人家里去玩，拾了一本人家不要的英文书。鲁迅顺手接过来一看，是一本《夏娃日记》，看了精美的插图和马克·吐温的笔调，感到值得介绍到中国来。他是托人翻译，找书店出版，又作《小引》介绍。

一个在邮局工作的青年，把彼多非的《勇敢的约翰》译稿寄给鲁迅。鲁迅“见译文的认真而且流利，恰如得到一种奇珍”，便帮助译者发表出版。为了出这个译稿，鲁迅从1929年到1931年，整整经过两年的时间的努力，与译者通信21封，与书店、杂志社接洽时写信12封，好不容易有了出版机会，又自己拿出钱来，亲自跑印刷所为插图制版，并校对五次，才把匈牙利诗人的这篇童话诗印成单行本。象这样对于青年作者大力支持、辛勤奔走，“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事例很多。鲁迅为无名青年费去这么多力气，“常常整天没有休息”，无非是想为中国的革命文化事业“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

鲁迅为了培养进步的翻译工作者，先后支持过的文学翻译团体有：“未名社”，“朝花社”，“译文社”。

1925年，北京一些穷学生，愿意踏踏实实、点点滴滴介绍一些苏联和俄国作品，但他们穷得连印刷费也没有。鲁迅和他们素不相识，仅因为介绍进步文化的志趣相投，就节约自己生活开支为他们拿出印费，校阅译稿。结果在一间破房里成立了“未名社”，骨干是韦素园。未名社为我国较早地介绍一批描写十月革命的作品，为新文化事业作出一定贡献。这和鲁迅的扶植、关怀是分不开的。韦素园带病坚持译作，鲁迅鼓励他“好好地保养，早日痊愈，无论如何，将来总归是我们的。”韦素园去世，鲁迅在悼文中肯定他的劳

绩，说：

“是的，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培者，决不会将他置置度外。”

“朝花社”是1929年鲁迅和柔石等几个青年在上海成立的，目的是想介绍一些东、北欧的作品和外国版画。鲁迅负担了五分之三的经费。这个团体后来由于有人投机取巧而夭折了，但鲁迅扶植进步文化事业的苦心是不可抹煞的。

鲁迅晚年，看到当时翻译事业衰落，又创办了《译文》杂志，目的是“供给真想用功的人作为‘他山之石’的，”换句话说，是为了给革命文学创作提供借鉴材料。这个刊物的头三期，由鲁迅亲自编辑。他除了编辑、翻译，还在插图、开本等形式方面费了不少心血。在鲁迅的关怀下，《译文》办成了一份内容进步、坚实，形式新颖、大方的好杂志，介绍了不少好作品、好文章，并且帮助培养了一些新进的翻译工作者。这在当时一片荒芜的翻译界，真可以说是仿佛戈壁中的绿洲。

六、“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开出了铁一般的新花”

鲁迅到上海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这九年间，国民党反动派一方面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同时也向着白区的革命文化运动进行着文化“围剿”。“国民党在文化“围剿”中，逮捕杀害革命作家，雇用流氓打手捣毁书店，禁止焚毁革命文艺书刊。革命的翻译书籍也同样受到反动魔爪的蹂躏。一切书报刊物，在出版之前，必须受到所谓“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检查，凡是有革命内容的文章，随时都有被禁止发表或任意删改的可能，无论翻译、创作，概莫能外。为了消除一切革命思想的痕迹，国民党检查官竟然荒谬到替外国作家乱改文章的地步。

鲁迅在一封信中说道：“虽是翻译，检查也很麻烦，抽去或删除

掉，时时有之，要有精采，难矣。”^⑪

为了向反动派作斗争，鲁迅发表文章和翻译时，不断变换笔名。例如他在《译文》上发表的译作，就曾化名为许遐、邓当世、茹纯。他说：“检查诸公，虽若‘并无成见’，其实是靠不住的，与其以一个署名，引起他们注意，（决定译文社中，必有我在内，）以至挑剔，使办事棘手，不如现在小心点好。”^⑫

他不仅自己巧妙应付检查官，还替其他译者想办法来摆脱文网。例如未名社要出版一本描写十月革命的苏联短篇小说，恐怕反动当局来找麻烦。鲁迅就帮助出主意说：“我以为…应即出版。但第一篇内有几个名词似有碍。不知在京印无妨否？但改去，又失了精神。…否则在此（上海——引者）印，而仍说未名社出版，以一部分寄京发卖。为此，则此地既无法干涉，而倘京中有麻烦，也可以推说别人冒名，本社并不知道的。”^⑬这是利用北京、上海两地反动当局“各自为政”这个空隙，给敌人来一个“捉迷藏”，使得革命译本能够出版发行。

有时革命译本内容紧要，采用合法手段让书店出版，检查肯定通不过，鲁迅就“不理睬他”，自己出版发行，一定要把革命译本送到人民手中去。他在一封信中说：“兄之译稿，仍可寄来，有便当随时探问，因为检查官对于出版者有私人之爱憎，所以此店不能出，彼店或能出的。或者索性加入更紧要之作，让我们来设法自行出版，因为现在官许之印本，必经检查，抽去紧要处，恰如无骨之人，毫无生气了。”^⑭《毁灭》和《铁流》就是采用这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强硬战术，自己印、自己发行的。

这样，鲁迅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采取坚定而灵活的斗争策

⑪ 1934年11月19日鲁迅致李霁野信。

⑫ 1934年8月14夜鲁迅致黄源信。

⑬ 1928年2月26日鲁迅致李霁野信。

⑭ 1935年1月15日鲁迅致曹靖华信。

略，打破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使得革命翻译作品“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宛委曲折，开出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七、关于翻译工作的两次论战

鲁迅在《准风月谈》后记中指出：“经验使我知道，我在受着武力征伐的时候，是同时一定要得到文力征伐的。”

革命的翻译工作也是如此。它一方面要防备国民党的野蛮扼杀，同时也要顶住一些资产阶级文人的恶意攻击。对于前者，要用坚定而灵活的斗争来抵制；对于后者，则要拿起批评的武器来打退。

第一个气势汹汹打上门来的是“新月社”的梁实秋。他在1930年发表《论鲁迅先生的“硬译”》一文，通过攻击鲁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本，来攻击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象梁实秋这样抱着资产阶级偏见的人，从立场感情上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水火不相容的。他咒骂鲁迅的革命文艺理论译本是什么“硬译”、“死译”、读起来“不爽快”等等，不过是代表了资产阶级文人学士对于无产阶级踏上文坛，搅乱了他们“象牙之塔”里的清梦，所表现出的惊慌不安。

鲁迅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武器，对梁实秋的谬论予以驳斥。鲁迅指出：梁实秋自命超然于阶级之上，其实在文章里“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明明代表着资产阶级老爷说话，“超阶级”的假面具已经用自己的手撕去了。而且，“无产者文学是为了以自己们之力，来解放本阶级及一切阶级而斗争的一翼。”^⑤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译本，本不是为了让资产阶级老爷太太们消愁解闷而翻译的，而是为了给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创作和评论，提供理论武器，为了那些“不怕艰难，多少要明白一些这理论的读者。”

至于翻译方法，也不仅是一个纯技术性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地位的人对于翻译也有不同的要求。资产阶级把文学

当作酒足饭饱之余消遣的工具，所以他们只要求翻译作品读起来轻轻松松、舒舒服服，不管译得错不错。梁实秋就说：“部分的曲译即使是错误，究竟也还给你一个错误，这个错误也许真是害人无穷的，而你读的时候究竟还落个爽快。”

鲁迅批驳道：“我却从来不干这样的勾当。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①⑤}

无产阶级的文学翻译工作，正如无产阶级文艺事业一样，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革命的翻译工作者，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尤其在翻译马列主义著作的时候，必须严肃对待，不仅对于原文的内容要以高度忠实的态度来翻译，而且为了保持原文的语言特点，在翻译时要尽量“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遇到汉语原来的句法词法不完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决不可象资产阶级文人那样，只图“爽快”，不惜歪曲原文，任意曲译，欺骗读者。

鲁迅宣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本，“只要还有若干的读者们能够有所得，梁实秋先生们的苦乐以及无所得，实在‘于我如浮云’。”^{①⑦}

1931年，赵景深又来攻击革命翻译书籍。他打出的旗号是：“与其信而不顺，不如顺而不信”。又说：“译得错不错是第二个问题，最要紧的是译得顺不顺。”这就是说，翻译作品，只要读起来“顺”（也就是梁实秋说的“爽快”）就行，用不着管它是否忠实于原文的内容。

这种“格言”的错误是很明显的。鲁迅指出：“译得‘信而不顺’的至多不过看不懂，想一想也许能懂，译得‘顺而不信’的却令人迷误，怎样想也不会懂，如果好象已经懂得，那么你正是入了迷途了。”^{①⑧}

^{①⑤①⑥①⑦} 《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同年底，鲁迅在《翻译的通信》中追溯了中国翻译史的经验，分析了对于翻译中“信”、“达”、“雅”三方面要求的认识发展，指出在严复的翻译事业中，“后来的译本，看得‘信’比‘达雅’都重一些。”

然后，鲁迅详细阐明自己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他认为翻译应该首先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并尽量保存原文的语气。针对赵景深所谓“宁顺而不信”的错误主张，鲁迅提出了“宁信而不顺”的原则。但是，“这所谓‘不顺’，决不是说‘跪下’要译作‘跪在膝之上’，‘天河’要译作‘牛奶路’的意思，乃是说，不妨不象茶淘饭一样几口可以咽完，却必须费牙来嚼一嚼。”“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这是因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据为已有。”这样的译本，“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①⑨}

对于所谓“不顺”的问题，鲁迅曾在批驳梁实秋时根据汉语发展的历史来分析道：“中国的文法……也曾有些变迁，例如《史》《汉》不同于《书经》，现在的白话文又不同于《史》《汉》；有添造，例如唐译佛经，元译上谕，当时很有些‘文法句法词法’是生造的，一经习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现在又来了‘外国文’，许多句子，即也须新造，一一说得坏点，就是硬造。据我的经验，这样译来，较之化为几句，更能保存原来的精悍的语气……。”这样的译法，开始要“容忍多少的不顺。”但“容忍多少的不顺”也不是永远的，“其中的一部分，将从‘不顺’而成为‘顺’，有一部分，则因为到底‘不顺’而被淘汰，被踢开。这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②⑩}

关于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说过：

①⑨⑩ 《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

鲁迅的“宁信而不顺”“不但输入新的内容，也输入新的表现法”的翻译主张，是针对当时的“宁顺而不信”的错误口号而提出的。鲁迅的口号保护了当时处于开创时期的革命翻译工作不为资产阶级的恶意攻击所伤害，也不受所谓只图“爽快”的谬论所迷惑，保证了革命翻译书籍在内容和语言两方面的基本质量。而且，鲁迅是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译文的质量问题，他在提出“宁信而不顺”的同时，也严肃宣告：“自然，世间总会有较好的翻译者，能够译成既不曲，也不‘硬’或‘死’的文章的，那时我的译本当然就被淘汰，我就只要来填这从‘无有’到‘较好’的空间罢了。”^{②①}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解放以来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水平比过去看来是大大提高了。解放前，由于反动派对革命文化事业的压迫摧残，由于翻译工作者单独作战，个人能力有限，也限于当时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解水平，当时的马列主义著作翻译水平已经不能适应今天的要求了。解放以来，学习马列主义已经成为革命人民自觉的、经常的政治需要，人民的马列主义水平比起在旧社会是不可比拟地提高了。革命翻译事业也是大大向前进步了。对于马列著作和重要的马列主义理论书籍，在翻译中一般是采取集体翻译或个人翻译、集体校阅的工作方式，不但内容的可靠性有了保证，而且在语言修辞方面也经过反复审核、润色，使译文既信且达，明白流畅，使得广大人民群众都能够直接阅读革命导师的原著。这是极大的好事。尽管如此，鲁迅当年所提出的翻译主张，仍然是正确的。不但在历

②① 《“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